

當一個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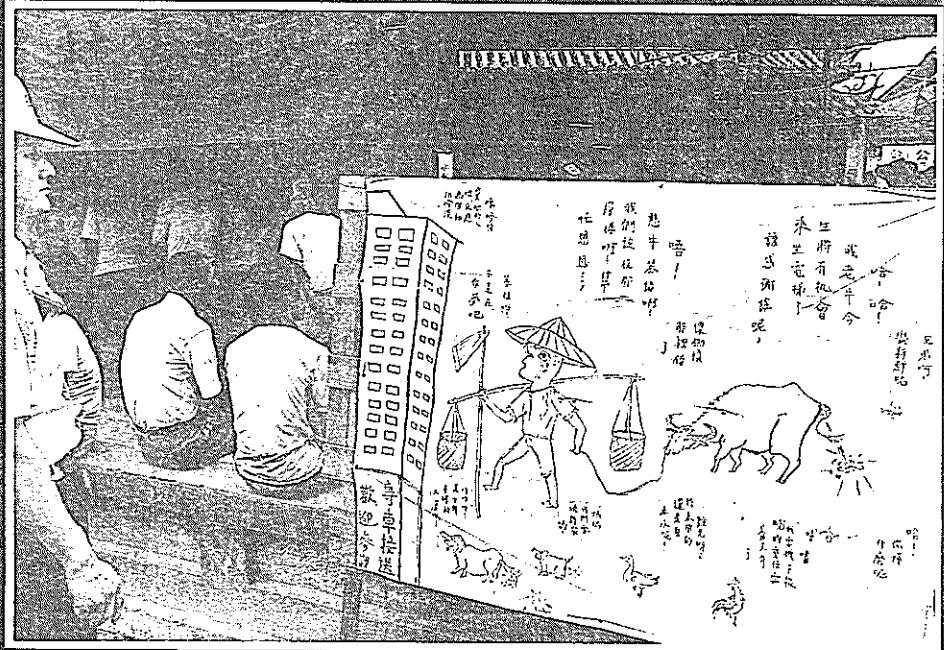
前年的八月十六日，台北縣的洲後村，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移民村落，在警察戒備下，夷為平地，永遠從地圖上消失了。這篇費時年餘的現地報告，告訴您一個粗疏、不正確的社區遷移計劃，會為政府與人民雙方帶來如何嚴重的損害與隱憂……

從地圖上

攝影 ■ 李文吉

消失……

撰文 ■ 李文吉 / 李明



困獸猶鬥 洲後村遭苗栗族移民村。三百年來一直堅守者這片富饒的漁米之鄉，至今全村九成九的人都遺姓陳，彼此間都看得出宗親血脈。

為了不使村民從此分頭離散，洲後村動員全村老少所有人力一再要求政府讓他們重歸遷村。不管新村土地再實、環境再差，他們卻願意嘗試。這是73年7月間，洲後村自辦的記者招待會。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執政者慎重地將一超千人小農村當作談判的對手。

年近七十的兩兄弟
陳水助和陳發來在拆
村前每天相伴下田種
作。他們連同過世兄
長的子孫們，十戶人
家五、六十口人，仍
共聚一堂。



前年的八月十六日清晨，天才開始灰濛濛地亮起來，台北縣政府調動了數百名警察、警校學生、鎮暴部隊、憲兵和便衣人員，把洲後村團團圍住。所有通向這個小村的大小道路全部封鎖了。幾部推土機和怪手升火待發。空氣中瀰漫著一種面對大變的緊張。

這是為了建設二重疏洪道，強制執行拆除洲後村的日子。

行動開始了。警備和安全人員，跟着推土機和怪手，進入村莊。無線電對講機架架地通話。執行人員基本上是立場堅定，態度溫和的。天逐漸地亮了起來。許多村民自動在怪手還沒砍向屋頂時，搬走自己的傢私。

沒有暴動、沒有流血。流淚，那是難免的。畢竟是百數十年慘淡經營下來的家園啊。到了當日傍晚，拆除洲後村的任務，基本上在平靜中圓滿達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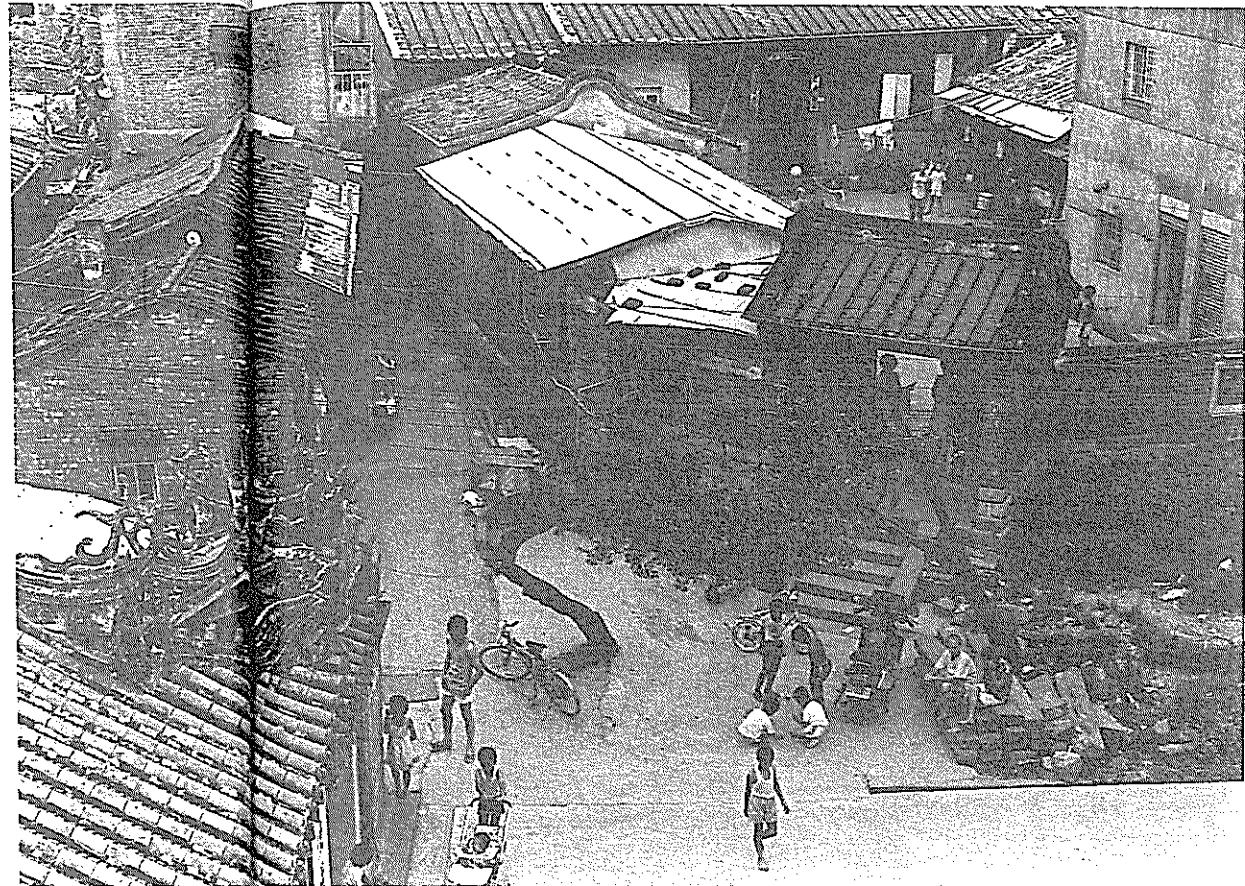
而洲後村，一個典型的漢族移民村落，從此自地圖上永久消失了。

● 從福建同安遷來的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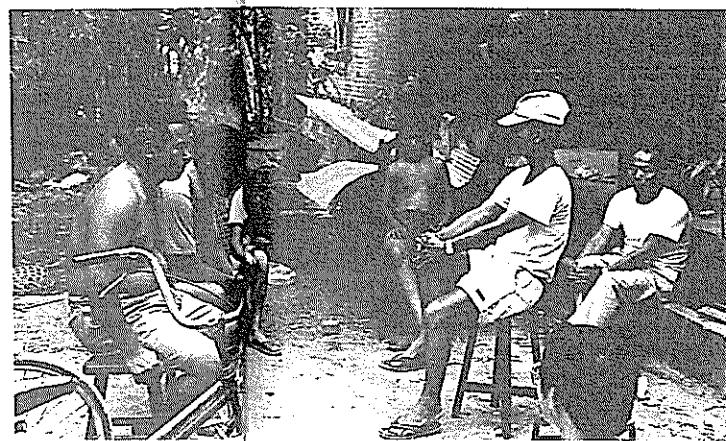
據洲後村中的長老們說，在兩百五十年前的清乾隆中期，福建泉洲府同安縣的一對陳姓兄弟，漂洋渡海，來台拓殖謀生。這對兄弟先是在今日林口台地一帶墾殖，但因土質不良，再遷到林口台地下淡水河口、一塊位於淡水河、觀音坑溪和大科坎溪間的三百餘甲沙洲，這就是昔稱「洲仔尾」的洲後村了。由於土質異常的豐沃，兄弟倆又趕回福建同安老家，招來更多同宗親友來洲仔尾這塊土地上，胼手胝足，建立家園。

兩百多年來，由陳姓宗族繁衍發展起來的洲後村，歷經五十年日政統治，一直到台灣光復後的四十年間，自然形成了她親睦、團結、守望相助和夜不閉戶的村風。即使經歷了近二十年來台灣工業化中巨大的社會變遷，台灣農村人口大量外流的今天，洲後村人口外流的比率却一直很低。有一位在國中教書的居民張老師說：「雖然今天村子裡的年輕人大半都到村子外的工業區找工作，願意繼續下田種作的不多，但他們

右上角是「德星堂」——陳氏宗祠，左下角是忠義廟；洲後村村民信仰與村治的活動中心與象徵。這種景象在台北盆地內已近絕跡。



洲後村的隣村竹華村，雖然還有這份午后的悠閒，整個竹華村早被都市化的巨輪轟碎，水利局來拆屋前，多數村民都「自動拆除」搬走了。像陳國(左三)和許吉義(左一)等少數幾個爭取遷村的農人，得不到村民支持，只有無力地發牢騷。



絕大多數却依舊住在村子裡通勤上班，為的是他們丟不下村子裡那股相親、相知的親人似的情感。」

村子裡，風俗淳美。在庸俗、色情文化大肆侵透農村的台灣，洲後村沒有賭場、沒有色情茶室，沒有演黃色電影和色情表演的小戲院。村子裡有個公共場所，是老祖宗蓋的一間忠義廟，供的是知府王爺。這忠義廟，一直到遷村之前，是村民交換資訊、娛樂、社交和祭祀等活動的中心點。

由於土地肥美，溪水豐足，洲後村的魚美蟹肥，稻子、竹筍和橘子長得特別香甜。洲後村的良田，在日據時代被強制改種甘蔗失敗，光復後又為了種蔗把砍光的竹園種起來，重種稻米。民國五十二年，錯誤的水利工程使洲後村成為澤國，村民立刻改種成本輕、收成快的菜蔬。憑憑歷史和政策的風吹雨打，洲後村的人却熱愛這塊生活了兩百多年的土地，執着地、勤勞地生活了下來。



●獅子頭，炸不得啊！

洲後村的農民，從祖宗傳來一個認識：這村子海拔低，又位於淡水河口，如果不是關渡隘口上一個叫獅子頭的小山丘擋着，颱風季節，海水倒灌進來，全村就得淹水。因此，村民很早就知道那小小的山丘獅子頭，是洲後村福禍所寄的守護神。

民國五十年左右，台北市急速發展，淡水河的負擔越來越沉重了。為了台北市民的安全，政府考慮搞好淡水河下游的疏濬問題。防洪計劃擬定下來，為了拓寬淡水河口以利疏濬，決定炸開獅子頭。

這個決定，使村民起了恐慌。村中長老都說：「獅子頭，炸不得啊！」村民們陳情反對，但獅子頭終歸還是炸掉了。民國五十二年，一場葛萊美颱風，使海水大量倒灌，陸上的水流不出去，頓時使洲後村、五股、三重、蘆洲數鄉鎮成為沼澤之國。世居泰山鄉，在某民營企業擔任工程師的林景政先生說：

在記者會中，陳水助的媳婦聽了村中律師陳化義的意見，鼓掌叫好又眼淚直流。



請願的標語掛了三、四年，每年村子都淹水，拼裝車照樣載菜趕早市，農婦照樣天天操持種作，日子總要過下去啊。

「淡水河關渡隘口尚未拓寬之前，因為河口小嘛，巧妙天成地使河水出海的流速增大，也使河水壓力大過潮水壓力，縱使有少量的海水倒灌，三兩天也退得乾淨，土地也不致被海水鹹化，尚可耕作。炸掉獅子頭，河口拓寬之後，使海水壓力大過河水出口的壓力，使潮水有進沒出。結果洩洪的目的沒達成，反而促成海水倒灌……」

到底當年淡水河口拓寬的工程，在設計上對不對，至今沒有一個科學的交代。但自斯以還，洲後村和隣近的幾個鄉鎮，每有風雨，水患却越來越嚴重了。

民國五十七年，因為台北防洪計劃益形迫切，為了設計出一個全面性的防洪結構，政府宣佈，把包括洲後村在內的三重、蘆洲、五股、新莊一帶低窪之地劃為「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全面禁建新的房舍廠房，為將來大防洪工程做好準備。這一禁建，到洲後村拆村之前，一拖就是十七個年頭。

●洲後村民爭的是什麼

十七個年頭，對於洲後村農民，並不只是一段漫長的時光而已。這十七年裡，新房不准蓋，可是好多農民把土房、茅草房一點一滴翻蓋成磚造水泥房；幾次海水倒灌，把土地弄鹹了，農民想法子抽地下水沖洗土質，照樣種作；現在常關大水吧，農民停止種長期作物，改種回收快的蔬菜。先不說這是經營了兩百多年的宗族村落，光說這二、三十年來農民投注在生活和土地上的心血和情感，就足以理解洲後村民為什麼曾經對為了二重疏洪道拆除家園，有那麼激動的反應。

國家要建設，社會要進步，就一定少不得開發，少不得巨大變動地貌和村莊。老百姓為了國家整體的好處，應當合作。洲後村的老百姓絕不是不懂這個道理。但是，當政府決定興建做為「北區防洪計劃初期工程」之一部份的「二重疏洪道，要把規劃中疏洪道口」

正中央的洲後村征收拆除，整個村子為之嘩然，竟而形成一股強勁的阻力。民國六十九年以後的四、五年裡，民衆為反對拆遷，給中央政府上陳情，甚至搞遊行示威。這陳情、示威，原都不失為一種官民間溝通的方式。可是由於政策上一直不很明確，又缺少現成的法令規章來處理複雜的遷村問題，整個問題就僵在那兒，一耽延，又是四、五個年頭過去。

現在，洲後村已經夷為平地。回想起來，民衆和政府爭執的問題點有這幾端：

●宣布為了疏洪道工程征收土地房舍，定期拆除時，政府和村民間的協調過程中始終沒有決定拆遷的確切日期。對於拆遷之後，整個村子要遷往何處，也始終沒有答案。直到七十三年八月拆村的前數日，才宣佈以灰窯為新村的地址，還要以兩年的時間割地整地。換言之，房子被拆以後，村民得再等兩年，才有地方再建家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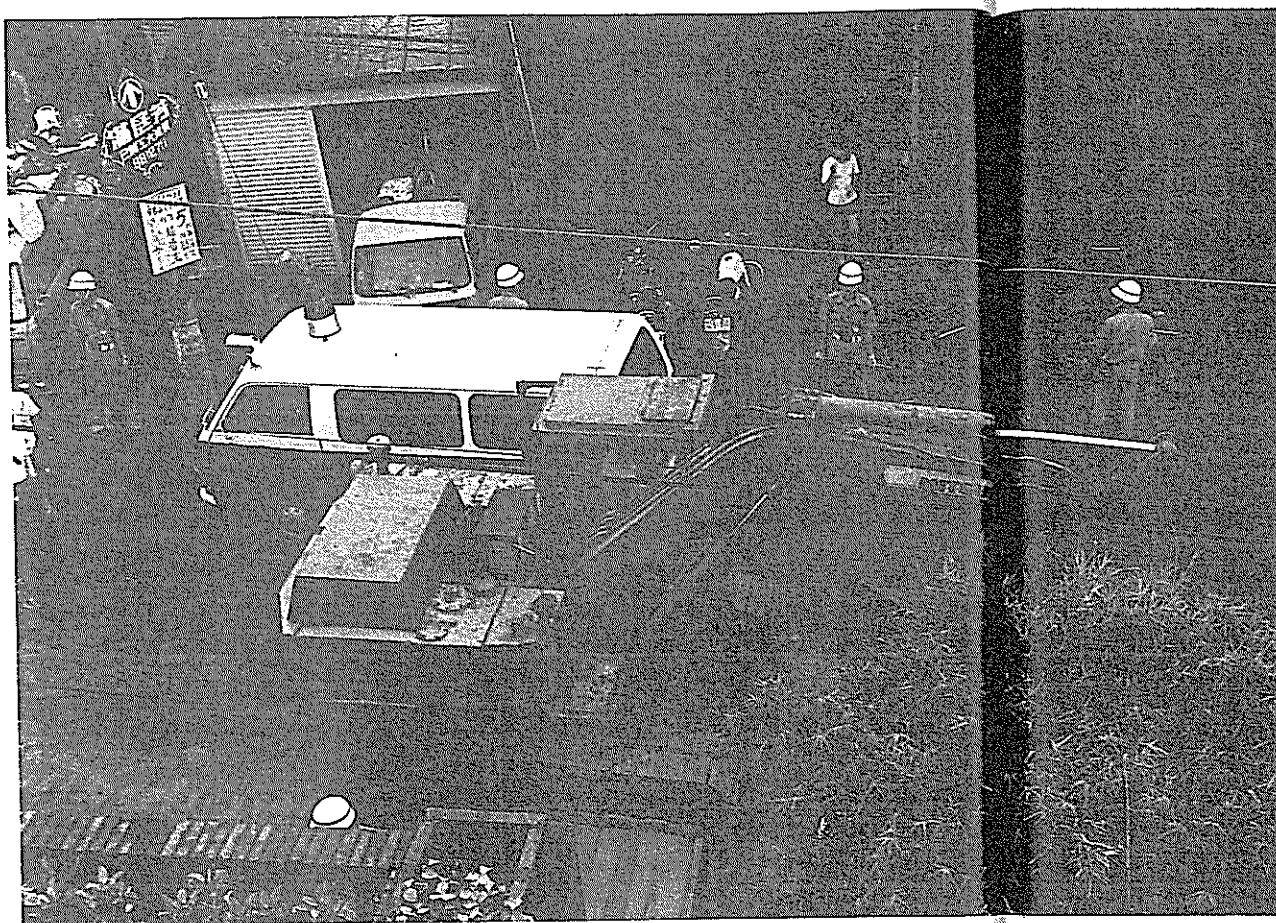
這兩年裡，村子拆了，家族四散的村民，怎麼過日子？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洲後村民因此堅持先建好新村讓農民搬進去，再拆除老村子。這就是著名的「先建後拆」原則。當時的省主席也親口答應了這個原

則，但後來省政府不肯認帳，下令強拆強遷，引起村民的忿慨。

●房舍徵收也是爭執的重要焦點。第一，土地是照價收買。可是洲後村禁建了十七年，公告出來的地價，全是十七年前的舊地價，農民以為不公平。其次，以十七年前每坪七、八百元的地價計算，耕作一甲地的農民，可以領到三百多萬的補償金。但是，問題在於，洲後村還保持父家長制的大族居，房子拆了，領到的錢，就必須均分給兒女。如果這筆錢均分給子女父母，每人至多只能分到四、五十萬元罷了。以這四、五十萬元，到蘆洲去買最差的公寓房子都不够。加上田園荒置，屋毀後又得各自租房子。收入少了，花費却比從前多了。等政府花兩年時間整頓灰窯那塊地，這筆錢已經缺去了一大角，就連將來灰窯的地，都買不起。原先是和土地密切聯繫着的農民，自此失去依戀，洲後村的農民自然是不肯答應的。

「若不是征收我土地只給一坪七十元的補償費實在刻薄，我才不會年紀這麼大不知羞耻，穿這牛綢衫丟人。」徐財元說。





73年8月16日上午八點多，
警備車與拆除大隊陸續開進忠義路。
洲後村民至此才相信縣政府以往的
低姿勢都是欺騙社會的。

查一查後台老闆是什麼人

• 最早的二重疏洪道，計劃由新莊中港入口，經五股沼澤右轉經蘆洲沼澤，洲後村原不在疏洪道上的。民國五十九年，計劃改了，疏洪道改走地勢高的二重和洲後村。村民不但懷疑這計劃的明智性，更懷疑洲後村被不合理地割入疏洪道，是因為受到三重地方利益集團的影響。原來，疏洪道一旦割成，十七年禁建豁然解除，中港、蘆洲的大片土地上，立刻豎起建築的看板，也出現了幾個新工地。有一位洲後村的老人家說，「小伙子，去查一查那些大蓋版面的建築商後台老闆是什麼人，你就曉得是怎麼回事了。」

• 洲後村因爲是個宗族村，村民間比較團結。爲了堅持「先建後拆」，村民自發地起來陳情、抗議、示威、請願。他們原先很想藉着這些運動性的行動，使

他們的苦衷受到政府層峰和社會的理解與同情。不料，我們的大衆傳播却一再地把洲後村民描寫成貪得無厭、蠻不講理、頑劣刁鑽之民。這些不負責任的、惡意的歪曲，使純樸的村民驚駭、傷心。七十四年夏天，村民組織了一個大規模的記者招待會，但第二天消息幾乎全被封殺。（忿怒、絕望的村民，改變了原先極力避免黨外媒體介入的態度，開始接受黨外刊物的採訪。但是，現在回憶起來，黨外刊物固然刊出了村民的不滿和真正的願望，但不久之後，也對問題失去了興趣。到了今天，村民覺得黨外輿論也遺棄了他們。）村民以爲，這是有計劃的大衆傳播暴政，十分不滿意。

• 在村民與政府進行協調與溝通時，有少數一些官員採取對村民各個擊破、分化離間的手法，造謠村中誰家已經因爲態度合作，多得好處，自動搬走，或者



拆洲後村很順利，縱使有這麼多悲憤的國觀者，也沒一個稍有抗拒的。縣長在前一天說，凡抗拒拆除者一律不發「自動拆除獎金」，並取消配售遷村地的權利。

竹草村的陳老鋐一家在怪手剷掉屋頂瓦片後，才在搬零細家當，他連兄弟老母四戶人家全搬進廢棄的小學教室借居了兩年。

當面提出特別優渥的理賠條件，要領導抵抗的村民出資鄰鄉。這些小技，被拒絕的村民傳出來，也引起村民的欵異與忿懥。

• 七十三年夏天，洲後村民舉行要求延緩拆遷的記者會，受到蔣經國總統的注意，並且親自指示「妥善辦理」。接着，縣政府派出幾十名社會工作人員，來傾訴洲後村民的意見。這個轉折使村民在極度挫折中重又懷抱希望。許多人見了社調員，就像見了親人似的，帶着眼淚把滿懷的委曲儘請傾吐。但是調查員回去了，台北縣長和社調員開會，禁止記者參加，會後發表一些至今不曾實行過的「輔導失業農民就業」、



陳發來在太太兒子們全搬到三重市住公寓後，在僅存的菜園內搭個木寮，獨居了一個多月。

「賑濟貧困農民」的決定。洲後村民懷疑，是不是有人膽敢違抗蔣經國總統關懷村民的美意？

●失去的忠義廟

洲後村拆除之後，兩年多過去了。村子裡三百多戶人家有五十戶住到堤防邊的臨時村，有兩戶住進更寮國小，其他全散遷到周近的成洲、蘆洲和三重。

忠義廟的老廟祝陳金泉說，全村的精英、鄉長老，全散了。忠義廟拆下來，領到五、六百萬補償費。「將來，這祖宗傳下來的忠義廟，總要再蓋起來吧。現在，蓋個廟，動輒就是千把萬。三百戶村民散的散，失業的失業，」陳金泉說，「來日到那裡去募足錢，把廟蓋回來呀？」

拆遷之前，政府答應把堤內農地重新分配給民村，可一年、兩年過去，也沒定案。結果一片好地，任由營造商挖土、倒垃圾，野草叢生、垃圾成堆，種在畦上的菜蔬荒枯殆盡。農民陳慶和說：

「村子拆掉了，外村人大量湧進來。過去純樸的村風消失了，外村人來這帶空地開賭場、開土鷄城、酒家。一入夜許多人開車子來尋歡作樂。深夜裡，堤後路上全是醉漢和塗紅抹白的妓女。我們的小孩，成群結隊去看土鷄城裡的查某。」

有些外地來的妓女受到警察取緝，竟然說她們原是洲後村良家婦女，因為村子拆了，男人失業，不得不出來操賤業，以博取警察的同情。「我們洲後村才沒

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小河內是漆黑的工業廢水，山坡上是急著出售土地作亂葬崗的五股觀音山。



這種女人，」陳慶和生氣地說，「村子拆了，風俗一下子全敗壞了啊！」

但是，洲後村的鄰村，這回也被拆平的竹華村人，倒是真有人出來經營茶室、酒店和山產點，當然也兼做色情的生意。洲後村的人看不慣，但竹華村的那些人說，不久每戶就得準備好八十萬買政府分配的地，不幹這行，到那兒去找能短期賺到大錢的活？

●生銹的鐵牛車

五十二歲的農民陳丁賜，是個天生樂觀進取的人。房子拆了，一時沒地可種，陳丁賜在路邊擺攤子賣番石榴。

「我一生用自己掙來的錢，蓋了72坪兩層的房子。這回拆了，賠償金75萬。」陳丁賜說：「不久前，患了疝氣開過刀，還有一陣子無法下田幹活，只好擺下個攤子吧。」

陳丁賜在新建村釘了25坪大的木屋。屋子裡堆滿了



陳水枝的媳婦領了五六十萬土地房屋補償費，全用來搭這個臨時廟（圖為廟的後側）。至於兩年後新村蓋好了，五十坪八十萬元，到時候再想辦法吧。

鐵牛、各種農具、噴霧器、農藥和肥料，全部蒙着一層灰，而鐵牛車都生了赤紅色的銹。「我等著身體恢復起來，下田去整那片荒廢的地，也得把這小木屋子好好整修裝潢。」陳丁鵝說，「把老婆孩子全接回來呀！」

徐財元的運氣好些。他的田，在拆遷中受毀損較小。六十多歲身體硬朗的徐財元，一看見營造廠的工人在他的菜園裡挖土、堆垃圾，他會拉起嗓子罵人、丟石頭，硬是拼死捍衛自己那幾分地。拆村那天，徐財元是村子裡少數幾個敢出來企圖阻止拆屋的農民之一。到現在，他還喜歡用那沙啞的聲音說，「水溝對面十家上百坪的鐵工廠，到現在不好好地在那兒冒烟？何苦就是要急着先把咱村子拆掉？」

● 篤農陳國

拆村以後，有五、六戶人家住到拆得只剩兩三間教室的更寮國小，他們把祖宗的牌位供在黑板前。教室裡，櫈櫃、條幅佔滿每寸可用的空間，子女和父母的床接在一塊，祖母的床就擠在瓦斯爐和飯桌邊。這就是農民陳樹根的住家了。

陳樹根七十九歲的老媽媽，每回看見記者去探望就掉淚。拆村後，老伴就死了。兩甲多的田地在疏洪道

竹華村的陳老勝和三弟陳樹根同老母十幾口人，住進小學教室。拆村後，田裏的菜瓜、苦瓜經常被偷，他們是少數復耕的幾家人家。



上，全被征用。原來合居一處的五男五女全四散了，只留下兩個孫兒在跟前。到現在，陳老太太固執地自己種菜賣菜，自炊自食。「我還能動哇，不能累了兒子。」他說。

前年，村子還沒拆，農民陳國有一幢體體面面的磚房，門前是一塊大樹成蔭的庭院。「選擇農具的房間都比現在住的教室大。」陳國說，「現在住得這個樣子，過幾天女兒要出嫁，這樣的家，怎麼讓人家來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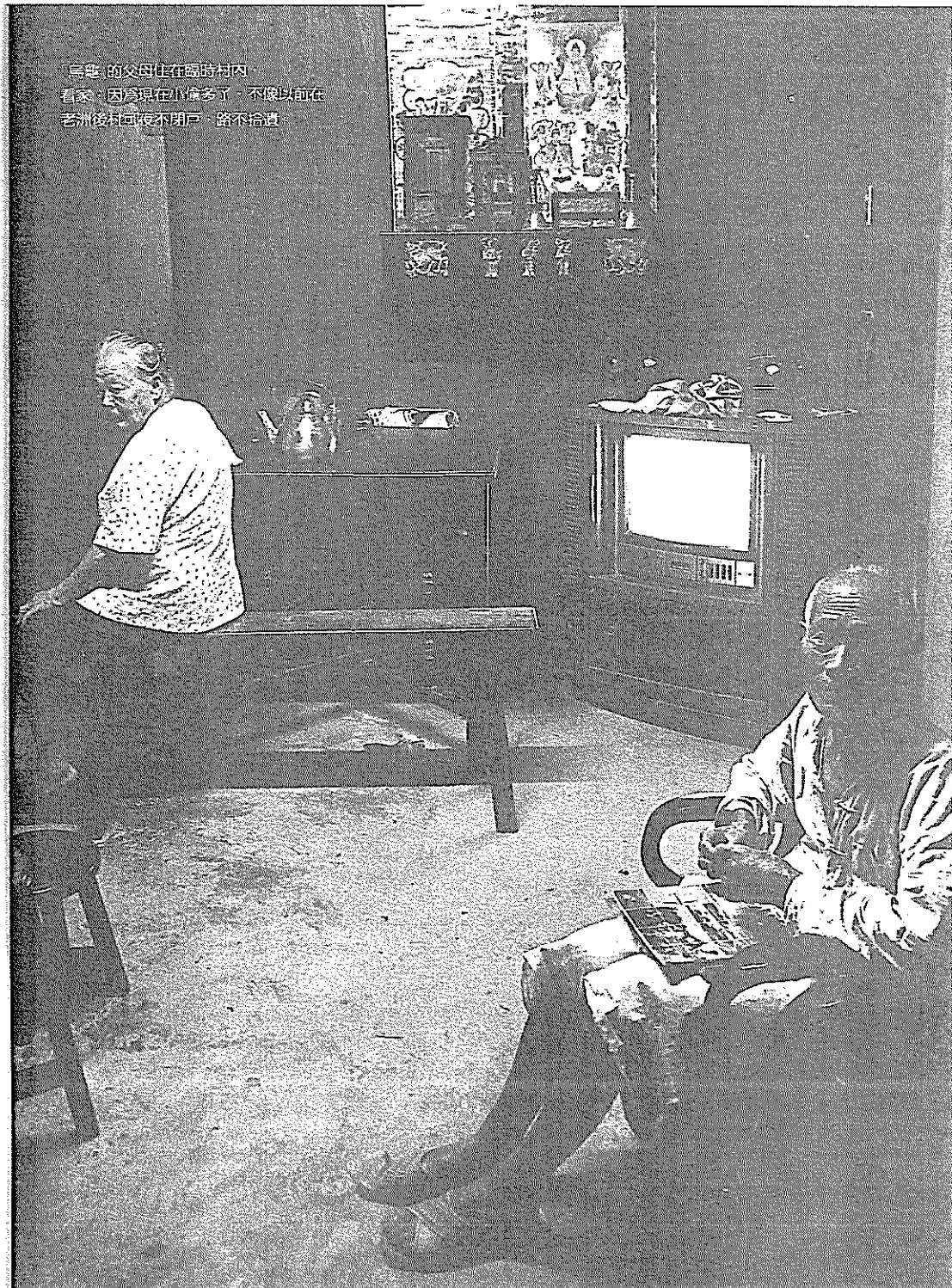
復耕的地還沒分配下來，一拖就是年餘。「現在在自己菜園挖溝墊土種菜，公家會來干涉。這樣再拖三、五年，地不分配下來，我們吃什麼呀。」手頭上幾十萬補償金，這樣拖下去，坐吃山空，將來拿什麼去買新村的五十坪地。過去接受過好幾次「篤農」榮譽的陳國，想起這些就苦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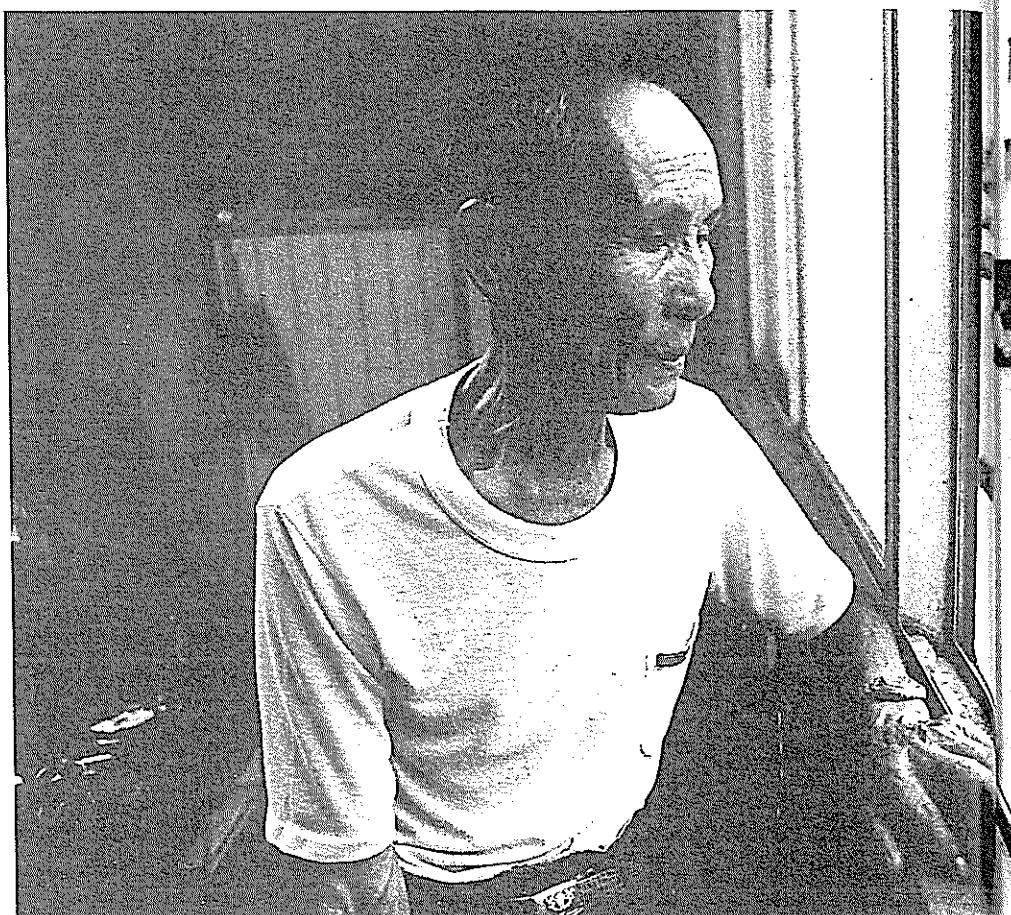
前年十二月，六十三歲的農民林萬福吊死在抽水站上。陳國說，「心裡氣悶，想不開吧，他兒子又失業。有個陳連生也在上月死了……」

難民營似的更寮國小教室前的空地上，有幾畦青菜和絲瓜，迎着陽光，發出嫩綠的顏色。陳國望着遠處高大的、新建中的堤防。「我們管那堤防叫萬里長城。我們，全是那孟姜女吧。」他說。

拆村後，洲後村約有五分之四的人家，在附近的公寓租房子住。但他們的心，還癡癡地繫在洲後村裡的菜園上。但是，種菜用的大菜籜子、板車、耕耘機、

烏鵲的父母住在臨時村內
看家，因為現在小偷多了，不像以前在
老洲後村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陳水助在拆村後，與未嫁的一兒一女
還居公寓中。自囚的生活使他不再有心下田。
做為十戶大族長的他成天擔心的是新村地十戶
五百坪要八百萬元，到時候到那兒找去？

抽水機却無法搬到三、四樓的公寓，只好選擇在田中央，沒人看守，任它風吹雨打，許多農具都被當廢鐵偷走了。

● 飼料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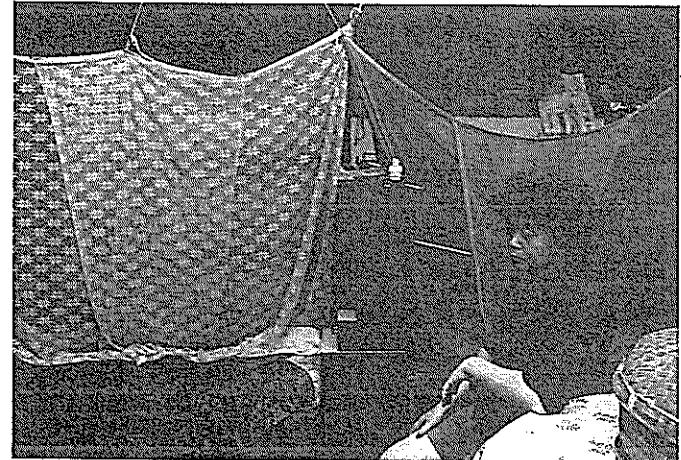
有些農民，不僅辛勞，每天花很長的時間往返公寓和菜園間，繼續種菜。像陳輝錄就是個典型。「過去全村的人互相幫助，在生產上互相支援。現在，村人散了。人手不够，請外村人幫忙吧，工錢貴呀。」陳輝錄說。

老農民陳水助，和大多數老一輩洲後村的農民一樣，拆了房子，除了酌留老兩口生活之外，把田地和補償金全分給了兒女，自己却堅持仍舊下田工作，自食其力。「人活着就該種作嘛，不能吃死米！」陳水助說。很多像他那樣的老農民，在田間搭個小木寮看菜園。田荒了，菜葉種不好，可至少還可以不讓營造廠的車子來亂整、倒垃圾。「可是，一個人在木寮裡呆着，沒個人說話，像個羅漢脚仔。」陳水助說，「可是，叫我天天待在三、四層樓上的公寓，我就變成飼料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成天吃飯睡覺，只有死得更快。」陳水助聽說好多老農人住到更遠的公寓，不知怎地忽然死了好些人。問他有沒有確實的例子，他說，「現在人都四散了，也都是風聞傳說，不知道到底確實不確實。」

陳水助於是沈默了。他靜靜地抽煙，却不忘老是叫



人間 (75年2月)



隙水助的太太借住朋友的公寓邊鋼棚下，五張大床是拆屋時搬來的，排成一列，五個兒子都還沒當兵，生病的丈夫無法下田耕自己的田或幫人代耕。

只要台灣社會不斷發展和開發，拆村遷村的事就不可避免。可是，從洲後村的經驗看來，就很沒有一套「妥善處理」的思考和政策、辦法。

我們以為，拆遷一個村落、一個社區，和剷除一個山，填平一條河溝，有基本的不同，應該事先做好細密的經濟的、社會的、人文的、心理的評估。在經濟上，怎麼查估，怎麼賠償，怎麼照顧青黃不接時期人民的生計；在社會和人文方面，怎麼分析和研究被拆遷社區的歷史、社會、文化和人文的質素，做出最妥善的溝通，建設一個充份照顧了原社區人文、歷史因素的遷村計劃。在心理上，怎麼評估遷村所帶來的心理的、環境的衝擊，使村民的心理適應不良減到最低……

洲後村拆遷的經驗，充分曝露了台北縣政府在社區遷移的工作上思想、知識的落後與不足，為政府與人民帶來難以估計的嚴重損害，留下不應忽視的傷痕。我們呼籲政府及早正視這個問題，學習社區遷移有關的現代知識與技術，正確處理以後類似的社區拆遷計劃。如果政府對於洲後村民當面的各項急迫的問題與困難，因這篇報告而做出明快、有效和誠懇的解決，則是記者最引頸待望之事了。